

读书笔记

(十二)

读书笔记

(十二)

目 录

专家解读中国经济（七）	1
回应和批驳所谓“中国经济责任论”	25
批驳南海问题上的歪论、抨击美军黄海军事威胁	48
雷云文稿（五）	61
积极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	67
世界经济（五）	70
国际政治（六）	74
郑永年文稿	92
台湾问题述评（七）	96
在海曙区社工协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102
政府主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社区研究	111
学习“国学”笔记（三）	119
佛学与《红楼梦》	180
解读宁波历史文化（五）	184
中国的世界遗产（二）	190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领土	192
学习中国革命史笔记（续）	196

专家解读中国经济（七）

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的文章《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着重论述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要抉择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60年过去了，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30年前我们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2010年，中国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党的十七大，新的远见开始凝聚。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三次重大抉择。

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第三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二、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

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

三、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国际“竞赛”已悄然涌动

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这是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

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向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今天，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将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维持。

这将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自负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将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

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

这将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科院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和艰巨性

党中央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

“好”让位于“快”。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

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2010年3月《人民日报》)

“低碳经济”争夺战 悄然逼近中国

《参考消息》报驻布鲁塞尔、华盛顿、东京记者撰写文章指出，目前以高效、低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以高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能源、产业、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一场低碳经济的争夺战正悄悄逼近中国。

一、欧美日竞相出台“绿色新政”，拉抬自己的竞争力

欧洲是低碳概念的发轫地，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最早行动者。早在2007年初，欧盟委员会就推出了新能源政策动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形容说，这一能源“新政”将带动欧盟经济向高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后来确立了到2020年要实现以3个20%为核心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即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20%，并将能效提高20%。低碳经济被确立为欧盟未来三大发展方向之一。

日本，2008年内阁会议制定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现在推进3R(Reduce、Reuse、Recycle，减排、重复利用、循环利用)运动，已成为日本社会的广泛认识。

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就疾呼，在绿色能源竞争中，美国“决不能接受世界第二的位置”。以节能为例，2016年，美国汽车的平均能耗必须达到每加仑汽油行驶35.5英里，即相当于每百公里耗油6.6升。按照这一标准，美国因此减少的石油消耗量，相当于从包括沙特在内的四大石油出口国一年进口的石油量。

发达国家在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以低碳经济为利器，开始有

战略、有策略地拉抬自己的竞争力，并全面主导着新一轮全球经济转型。在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欧盟支持先就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市场开放单独达成协议，就是急于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真金白银。

为了保护内部市场，欧盟“绿色壁垒”也越垒越高，各式节能环保标准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欧盟的一个障碍。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主张，对减排力度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规定，如果其他国家企业没有增加碳排放成本，美方将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二、中国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邹骥说：低碳经济提出的挑战本质上是对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源权利的挑战。中国在传统国际经济形态中的资源、投资需求和技术变动优势，面对低碳经济发展趋势都会变为新的比较劣势，使得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的现实是：具有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资源禀赋，正处在以重化工业主导的、伴随城市化进程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碳发展阶段，并且已经形成了与之相应的高碳技术体系。截至到目前，我国的技术体系依赖的是发达国家的传统技术路径，如果低碳经济重新洗牌，中国有被发达国家拉大差距、加大依赖度的风险。举例来说，我们需要由60多种关键技术组成的技术体系来支撑节能减排，包括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的技术。而60多种技术里面有40多种中国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将不得不再次为低碳技术埋单。

在低碳经济下，标准的制定也将对中国形成掣肘。若由发达国家来制定标准，不接受不符合节能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中国将再次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间，西方国家通过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高碳产品征收关税将呈增加之势。

（摘自3月11日《参考消息》）

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地位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的范畴写入党代会报告，使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上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使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尊重自然，维护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其实现途径是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秩序。

生态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含了生态文化、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科技与生态制度等七个基本要素。

1、生态文化繁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柱。生态文明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生态文化的繁荣创新为先导，建构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在世界观上，需要超越机械论，树立有机论；在价值观上，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平衡；在发展观上，需要超越“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增长主义，建立“质量重于数量”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整体发展观。

2、生态产业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要求生态经济系统必须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效益，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来发展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3、生态消费模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基础。生态消费模式是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前提，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基础上的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需要依赖消费教育来变革全社会的消费理念，进而转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引导公众从浪费型消费模式转向适度型消费模式，从环境损害型消费模式转向环境保护型消费模式，从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转向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消费方式。

4、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就难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实践要求就是要统筹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的威胁，有效控制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和可持续发展。

5、生态资源节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没有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人类社会发展就会失去资源基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保护、节约、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循环利用废弃资源，积极开发可再生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保障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6、生态科技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量。生态科技用生态学整体观点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
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将生态学原则渗透到科技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性质中。坚持走生态科技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也是加速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量。

7、生态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本性动力在于制度创新。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生态战略规划制度，着眼于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发展，真正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中来；另一方面，要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建设与创新，鼓励更多主体的积极参

与，创建更加公平的法制环境，建立更加灵活的政策工具，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就像五根巨大的支柱，共同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1、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

在基础层面上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着对立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要保护环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会或多或少地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又是统一的。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给人类自身提供良好的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我国经济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矛盾：一是经济总量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资源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容量有限以及环境容量利用效率相对低下的矛盾。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建设，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坚决摒弃“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传统做法，大力实施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生态经济化等战略。

2、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

两者之间既是因果关系，又是包容关系。政治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条件。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因此，政治建设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政治建设着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文明建设则着力于处理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政治建设被生态文明建设所包容。

目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障碍主要在于：一是政绩考核机制的扭曲，片面强调政绩考核的经济性；二是公众环境权益的受损，公众无法享受到足够良好的作为生存权之一的环境权和作为参与权之一的环境权。生态文明观念引领下的政治建设，就是要积极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干预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和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机制的相互制衡，就是要构建以别无选择的强制性机制、权衡利弊的选择性机制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机制的相互协同。

3、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

两者既存在交叉关系，又存在重叠关系。从一定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为文化建设提供广阔的舞台；而文化建设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必然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从另一个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都需要处理与解决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又是属于重叠关系。

生态文明理念视角下的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生态文化观念不够稳固。为此，必须树立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相吻合的生态文化观念，使包括绿色生产观、绿色消费观、绿色技术观、绿色营销观等在内的生态文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要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增强生态资源观念，优化生态环境资源配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转变消费行为模式，崇尚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4、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

两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民生。生态环境质量是保障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最基本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作为基本民生需求的环境权益就维护得好；公众参与包括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务在内的社会管理的程度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就高。

从生态文明视角看社会建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公众日益增

长的环境质量需求与政府不尽理想的环境质量供给之间的矛盾；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事务的愿望强烈与公众可能参与环境管理事务的机会有限之间的矛盾。政府是环境质量这一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必须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的政府责任，设立更加广泛的政府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建立更加强硬的政府环境保护的强制性机制。同时，要大力推进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程度，探索建立环境协商机制，形成公众与政府、公众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与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

（引自5月17日《浙江日报》）

作者：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沈满洪）

温家宝谈人民币币值和购买美国国债问题

一、关于人民币币值问题：

第一，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从2005年7月份开始的，到现在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我特别强调指出，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世界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并没有贬值，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

第二，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2009年，我们的外贸出口下降了16%，但是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我们统计了去年37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情况，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是增长的。就是欧盟地区，出口总体下降20.3%，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只下降1.53%。去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多达760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美国去年出口下降17%，但是对中国的出口仅下降0.22%。

第三，一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是由一国的经济决定的，汇率的变动也是由经济的综合情况决定的。我们反对各国之间相互指责，甚至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一国的汇率升值，因为这样做不利于人民币

汇率的改革。

第四，人民币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关于购买美国国债问题：

我们对外汇储备的要求，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流动，第三是保值增值。我们在国际上之所以购买一些国家的债券，都是为了通过多元化的经营达到我所说的目的。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国，币值的不稳定引起我们很大的忧虑。因为国家的金融资产不容得有一点的闪失。我还要强调另外一面，美国国债是以美国国家信誉做担保的，我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让投资者放心。这不仅对投资方有利，对美国也有利。

（新华社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问中外记者》）

注：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务被公认为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因为美国政府从未拖欠过债务。根据4月30日《参考消息》载，美国财政部30日透露，去年12月底，中国持有8948亿美元国债。日本去年12月持有7657亿美国国债。据5月19日《参考消息》载，截止今年3月，中国的美债持有为8952亿美元；日本为7849亿美元，位列第二。据6月17日《参考消息》载，今年4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券达到了9002亿美元，日本持有7955亿美元。中国政府依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

关于汇率改革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5年7月21日至2008年7月。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以我为主有序推进，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接近21%。

第二阶段，从2008年7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

6.82至6.84元区间窄幅波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波动幅度，人民币汇率没有贬值，实际有效汇率反而有所升值，保持了基本稳定，事实说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第三阶段，2010年6月17日，我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本轮汇改不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进一步推进汇改并不等于人民币升值

首先，我国进出口已渐趋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路下行，从2007年的11%下降到2008年9.9%，2009年的6%，直到今年一季度的3%，国际收支正向均衡状态趋近。这样一来，人民币升值的基础大为弱化。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低。

其次，从国际看，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从国内看，内需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不平衡，通胀压力也可能逐渐上升。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难以出现单边上扬的走势。

第三，为什么要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单一美元来看待人民币汇率水平？今年1至5月，前五位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和我国香港）进出口已分别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6.3%、10.1%、9.4%、7.5%。同时，资本往来也呈现多样化和多区域特征。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如果盯住单一货币变化，不适应贸易投资货币多元化的需要，也不能反映汇率的实际水平。多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及其变化更能准确反映真实的汇率水平。从双边汇率转向多边汇率，更多关注篮子汇率变化，以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来看待人民币汇率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对某一国货币的汇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

三、进一步推进汇改对中国经济的好处

第一，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汇率增强弹性，有助于引导资源从出口部门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汇率浮动有利于服务

业发展，将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第二，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当外汇流入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央行只能被动地收购大量外汇，相应地，就会投放大量人民币。而货币供应的过快增长，会诱发通胀和资产泡沫。汇率弹性允许增长，央行被动收购外汇的规模就会小很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也将明显改善。

第三，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环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继续推进汇改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坦率地讲，如果真打贸易战，对贸易的另外方不利，对我国一些出口企业的冲击可能也大于短期汇率波动带来的有限影响。

（根据6月20日央行新闻发言人谈话和
21日《人民日报》记者田俊荣文章整理）

奥巴马执政以来 对人民币汇率的三次发难

第一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尚待参议院批准就任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在2009年1月回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询问的信件中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为此积极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他此言一出，美国上下齐声指责，因为当时美国仍在深度危机之中，迫切需要其他国家资金，与中国挑起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最终，盖特纳淡化其原先的讲话，修正自己的立场。美国财政部在随后两次汇率报告中，都明确承认，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

第二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去年7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在这次会谈中，美方未紧抓人民币汇率不放。一个原因是在危机时期，美方需要中方的合作；另一个原因是中方采取了积极态度，